

“中日文学关系及日本文学研究”专栏

【主持人语】本期专栏为“中日文学关系与日本文学研究”专栏,刊出2篇文章,就中国近代南社诗人高旭的涉及日本题材的诗歌、日本古代女性日记文学的经典化等重要问题,作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富有新意的阐释。2篇论文的第一作者都是在相关领域学界活跃着的女教授,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中日文学关系研究及日本文学研究的特色与水平。

【主持人简介】王向远(1962-),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及各种单行本18部(含合著4部),发表论文120余篇。

从高旭的涉日诗歌看晚清中国人的日本观

陈春香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南社诗人高旭,在20世纪初的留日潮中曾东渡日本留学,他在旅日期间创作了大量与日本相关的诗歌,这些诗歌记述了他在异国生活的见闻、感受,表达了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也展现了其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相当典型的日本观。

关键词:高旭;涉日诗歌;晚清;中国人的日本观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3-0126-06

高旭对很多人来说是极其陌生的,在大部分中国近现代史和近现代文学史中极少被提起。仔细翻检历史,我们发现,在清末民初那个风云变幻、动荡频繁的时代,他和当时历史、文学的一些重要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尽管高旭不是那种叱咤风云、引领历史的伟人,但他一生的求索乃至“失误”都和时代紧密相关,仅从这一点看,对他和他作品的研究很有必要。

高旭(1877-1925年)字天梅,号剑公,又字慧云、钝剑,江苏金山(今属上海)人。中国同盟会成立之时的第一批会员,担任同盟会江苏省主盟人,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众议院议员,反对袁世凯独裁的坚定分子。高旭是南社的三位创始人之一,所创办的健行公学曾经是上海和东南地区革命活动的中心。高旭还是留日学生革命刊物《醒狮》的创办者,近代多家革命报刊的核心作者,写过大量的短论、时评。他和叔叔高吹万、弟弟高增创立觉民社并编辑发行了以启发民智、宣传爱国主义为主旨的《觉民》月刊(1903年11月-1904年8月)。他精通西方各国宪政,曾写下精彩的《对于天坛宪法草案商榷书》。他曾伪造《石达开遗诗》以鼓舞反清革命士气。他是“诗界革命”的积极响应者与参与者,创作了大量“新派诗”和“歌体诗”。他留下的六万多字的《愿无尽庐诗话》反映了他的文艺思想,也为研究当时文坛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高旭于1904年秋东渡日本留学,到1905年底因反对日本政府文部省的《取缔清留学生规则》而罢学归国。留学期间,高旭除学习政法、组织革命活动、游览日本山川外,还以旺盛的热情创作了大量的诗歌。高旭旅日时期的诗歌和他

收稿日期:2009-03-16

作者简介:陈春香(1956-)女,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

日文学与中日文化关系研究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社网 <http://qks.cqu.edu.cn>

在其他时期创作的一些涉及日本的诗歌作品,我们且把它称作“涉日诗歌”,这些作品有的记录了他在异国的生活、见闻和感受,有的则表现了他对中国现实的思考。虽然,他的这些创作是以中国传统的诗词形式为主,但如果用跨文化的眼光去审视它,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去发掘它跨文化、跨国度的特质,就会发现其特殊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这些诗歌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日本观的微妙变化,可作为我们研究的标本,因此,高旭的“涉日诗歌”就具有了相当高的研究价值。

高旭东渡之时正是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之后中国留学日本热高涨的时候。由于原来不被中国人看在眼里的日本的崛起,使中国知识分子看到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会卓有成效,认为“日本学习欧美,故其强同于欧美。吾若学习欧美如日本,则其强亦必如日本然。吾文学风气去欧美甚远,势难直接为之,不若间接以学习日本之为便。庚子以后,各省留学于东京者骤增数倍,其不本此意以为宗旨者,恐百无一人也”^[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旭也正是抱着“不作书生作学生”^[2]³⁶⁸的态度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政法大学学习的。

正是由于“日本学习西方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样一种认识成了中国朝野的共识,因此,对日本成功的羡慕和把日本作为中国的榜样的心态,是当时留日学子中大多数人的心态。高旭的许多涉日诗歌,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态写下的。他的诗歌表现了他的日本观感。

民性勤劳号朴诚,衬将风物绝清明。青山两岸成都市,半日闲从画里行。(长崎泊舟)

愧兹都会真繁华,满眼欢虞万灶炊。怪他富士多情甚,隐约山光扑面来。(登浅草凌云阁)

樱花满上野,游兴一时揭。深入画图里,漫天飞绛雪。濯濯屐齿声,断续难分别。姿容美窈窕,要眇宜修洁。衣香人影间,万念时起灭。名花与美人,秾艳两超绝。余情苟信芳,对景自怡悦。(上野公园看樱花)

此间佳种舶来多,白版标以某某科。我拟编成《新尔雅》,释花释草畅收罗。参差修竹绿回环,流水潺潺心自闲,一缕脑丝天样远,浑疑身不在人间。

微风隔水暗传香,如是声闻净土缘,万木森森人迹少,尽情游遍蔚蓝天。(避暑小石川植物园中)

树木环绕足清幽,爱着罗裳淡荡游。(游爱宕山)

从这些诗歌中^[2]⁴⁷⁻⁴⁵,我们可以看到高旭眼中的日本是:风物清明、景色如画、都市繁华、山区幽静,民性勤劳朴诚、人人安居乐业,简直就是一个理想的桃源胜境。在这个理想国中,连监狱这样的地方也是“四面春风”、“琴声清扬”,是能够使“狡顽儿”一夜之间化为“善良”的“桃李场”,是“众生”的“平等”之乡,就像“天堂”一样。

行行之川越,仿佛桃李场。眼底诸少年,携手如雁行。一曲国民歌,四面春风香。跳舞应音节,琴声清以扬。附丽工艺科,生计庶以康。亦有制造厂,陈设东西厢。再使畜鸡豚,研究耕稼方。据言犯罪人,

宜农不宜商。制度除阶级,教育大发皇。佛子与众生,形影淡然忘。一切大自在,同游平等乡。终使狡顽儿,性质化善良。朝则为鸱鸢,夕则为凤凰。人云此地狱,我说是天堂。(《至川越参观少年监狱》^[2]⁵⁸)

毫无疑问,高旭眼中的日本带有相当程度的主观美化,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前述的当时留日学子的普遍心态,如果上升到理论上其实就是一种“定型视野”和“时空视差”。由于当时举国的共识是日本学习西方非常成功,赴日之前许多人的日本观已基本定型于此。再加上作为外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毕竟居于表象,而对自己国内状况的不满,更强化了他们将所看到的现象加以理想化的趋势。“时空视差是造成涉外文学中将异国异族理想化、观念化,并使之成为‘乌托邦文学’的必要条件之一。当作家们不满本国的社会现实的时候,就可以渲染、美化异域情调,将某一外国或外国文化作为理想寄托”^[3]²⁴²。正是因为这种理想化,高旭称赏日本的社会改革,在诗歌中把日本整体形象作为“桃花源”来描写,甚至对日本的自然景色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美化,请看他的《游富士山杂诗》^[2]⁵⁴⁻⁵⁵。

远行不必裹余粮,当暑无需薜荔裳。小宿清樽松下屋,水云泼墨比秋凉。(宿御殿场松下屋)

鸟啼著耳不知名,远客漫游天放晴。一片菁林深不测,平明跨马雾中行。

林光摇乱杂山光,一路浓阴引兴长。恰好淡云微雨候,赏心茶话太郎坊。(太郎坊小憩)

梦中胜迹快探寻,石室更深拥冷衾。败壁棱棱人悄坐,忽看星斗落衣襟。(第八合石室中)

横空一白接微茫,隐约迷离落日黄。脚下云烟起波浪,顿疑身渡太平洋。(登虎岩)

茅屋草履野人装,来去纷纷行客忙。同是游山观念异,或占气候或烧香。

枯坐空山断俗缘,偶来对石学参禅。芙蓉八朵悉清静,妙历华岩第一天。(富士山顶八峰环绕,故有八芙蓉之目)

惊波倒卷水弥漫,大壑高悬百亩宽。十丈奔流纵奇态,此种定有怪龙蟠。

万船梭织浪飘摇,洪水掀天景廓寥。自笑囊无枚乘笔,又教一度枉观涛。(二之宫火车中观海)

来自江南水乡的高旭,不但对岛国特有的海景激赏,惭愧自己“囊无枚乘笔”,不能记录“奔流”恣肆、“奇态”竟现的大海,而“枉观”雄壮的波涛,就连江南常见的“淡云微雨”、“雾中行”、“一路浓荫”这样的平常景象,也是赞叹连连。这些描写已经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其中隐含着对日本这个东洋岛国的欣赏、赞美和羡慕。在他的《登富士山放歌》中,富士山就更是崛起的日本形象的象征了。“不见乎富士盘旋地轴撑天起,山势蜿蜒疾走如游龙。造物磅礴凝结此物质,横绝东亚海国气象雄”。“撑天起”、“疾走如游龙”、“磅礴”、“横绝东亚”、“气象雄”,这些词,与其说是赞美富士山,不如说是赞美日本。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中国人把日本看作理想胜境并大加赞美者,并非自高旭始,而是始于对近代中国人日本观产生过极大影响的维新派人物黄遵宪。在高旭写这些诗的20多年前,黄遵宪作为政府的外交使

节,就已经记下了差不多同样的感觉。《日本杂事诗广注》中记录了他陶醉于桃源乡般日本美的感受:“樱花,(中略)墨江(隅田川)左右有数百树,如雪如霞,如锦如茶。余一夕明月,再游其地,真如置身蓬莱中矣。”^[4]在《日本杂事诗》中还有这样的诗和注。

九州地脉阻昆仑,裨海还瀛水作门。圆峤方壶虽妄语,分明世外此桃源。

有客长崎者,为言商贾交易以诚信,妇姑无勃谿声,道有拾遗者,必询所主归之,商人所庸客作,令司管钥,他出归无失者。盛哉此风,所谓人崇礼让,民不盗淫者邪!《入境庐诗草》

黄遵宪笔下的日本,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民风淳朴。

吴其昌在《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中,也记录了梁启超谈他初到日本的印象: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奋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癯残疾,肮脏邈邈,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①。梁启超对日本的赞美比黄遵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柳亚子1904年作《除夕杂感》一诗,回忆拒俄运动,也把日本称作蓬莱仙岛:“蓬莱仙岛居留地,学界风潮意气雄。”

可见,高旭的看法并非个别,维新革命后的日本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的确是理想之所在。当然,高旭诗歌中的描写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而诗人这种对日本描写的主观化倾向,正表现了他希望从日本形象中“寻找能够支持自己的思想意识的东西^{[3]242}”的期盼。那么,高旭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意识”,他又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来作为自己“思想意识”的“支持”呢?对于这点,我们还需要了解高旭留学东京之前和在东京时的思想及活动。

在20世纪初浩浩荡荡的留日大军中,有一些特殊的人——清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1898年维新失败后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日本;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也有一批反清志士流亡日本;孙中山等领导的革命派也因屡次发动武装起义而受到清政府的通缉,避难于日本。这些人身边都有作为追随者的留日学生。当时的日本已成为中国改良派与革命派在国外进行活动和宣传的主要基地,也是20世纪初中国各种新思潮的发源地,吸引了大批中国进步青年。高旭虽然并非因追随革命而来日,但他赴日之前和他在日本的活动却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个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爱国青年。出国之前,高旭的思想就已由改良转向革命,他的革命思想主要是通过他发表的诗文表现的。他作于1903年的《读〈法兰西革命史〉,作革命歌》、《读〈俄罗斯大风潮〉》和1904年的《海上大风潮起作歌》等,最能表达他当时的思想倾向。

压力喝起涨力来,怪云毒雾顷刻开。国民活气龙耶虎,跃跃齐登新舞台。脑兵铲除巴士的,自由权利悉夺回。再诛独夫却普奥,万众一声欢如雷。剥

民脂膏吸民血,鲁意十六何为哉!阻之愈甚愈决裂,硝烟药云惨难说。蹈汤赴火灼太平,掷万头颅流万血。呜呼!我欲不革命,民气日折磨;我欲说革命,忍看血成河。独夫独夫可奈何!(《读〈法兰西革命史〉,作革命歌》^{[2]344})

奴颜婢膝可怜虫,哭倒欧西布鲁东。我爱自由如爱命,铸金愿事此先锋。不须高击自由钟,破却盲云万一重。妙手织成新社会,神奇变换殆犹龙。霹雳当头亦快哉,独夫横陈骨成灰。最倾弱女如花貌,显出屠龙手段来。君权无上虎狼骄,喝起人群热血烧。冷落神州竟如此,何人为演大风潮!(《读〈俄罗斯大风潮〉》^{[2]344})

亡国惨状不堪说,奔走海上狂呼号。非种未锄气益旧,雄心郁勃胸中烧。拟将大网罗天鹏,安得阔斧斫海鳌。鼠子跳梁豺狼横,中原万里莽蓬蒿。危哉死矣瘡痍夫,盍进大黄与芒硝。翻倒鸚鵡碎黄鹤,趋迫上途乘风麈。打破局面贵速拙,昭苏万象权我操。相期创造新世界,簸山荡海吼蒲牢。沐日浴月热潮涌,鱼鳖瑟缩魍魉逃。自由钟铸声初发,独夫台上风萧萧。当头殷殷飞霹雳,路易十四心旌摇。何来咄咄此妖孽,助桀为虐狐狸骄。文明有例购以血,愿戴我头试汝刀。有倡之者必有继,掷万骷髏剑花飘。中夏侠风太冷落,自此激出千卢骚。要是民权大发达,独立独立呼声嚣。全国人民公许可,从此高涨红锦潮。……做人牛马不如死,淋漓血灌自由苗。(《海上大风潮起作歌》节录^{[2]35-36})

从上面三首诗中,可看出在外来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高旭的革命思想逐渐发展形成的过程。在《读〈法兰西革命史〉,作革命歌》中,他还“我欲说革命,忍看血成河”,对革命暴力及其后果心存疑虑,而《读〈俄罗斯大风潮〉》中,已经在为“冷落神州”呼唤“大风潮”了,到《海上大风潮起作歌》就已经视死如归,要用鲜血来换取自由了——“淋漓血灌自由苗”。如果说高旭出国前的主要革命活动是在一些鼓吹变革和革命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的话,那么,到日本后他就积极加入到有组织的革命活动中了。到东京后不久,他结识了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宋教仁、陈天华,真正理解了革命救国的道理,并经常与留学生田桐、程家桢等,一起探索反清救国的道路。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横滨,着手组织革命团体,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高旭成为同盟会第一批会员,并担任江苏省主盟人。1905年9月,他创办的《醒狮》杂志成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创刊之前东京留学界最具有批判锋芒和战斗力的刊物。“从此,高旭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成了一个纯正的革命党人”^{[2]3}。当然,革命并非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是使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一种手段。高旭觉得自己梦寐以求的国富民强的理想在日本已经是现实,而日本的这种得以实现的理想正是革命的结果。他来日本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获取革命的真经,使中国像日本一样强大起来,不再受列强的欺辱。这种诉求在他的一些诗歌里也有明显的表述。在《祖东二月,闻国中大狱又起。酒酣耳热,引吭为

①转引自夏晓虹. 晚清社会与文化[M]. 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29-30.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社网 <http://qks.cqu.edu.cn>

歌,亦变征之声也》一诗中他这样写到:“男儿慷慨意气雄,破浪万里乘长风。舍舟登陆发长啸,脱帽来谒南州翁。参天铜像争识认,如此伟人世无并。即今精气尚如生,自是东洋老革命。”^{[2]369}这里,对“东洋老革命”的赞叹、拜谒其实就是对其革命的赞赏,也是对中国未来的希望。在诗人的心中,日本已然是一个革命成功的样板了。“拟挟乡间诸年少,把臂横来渡此间。令他一一发雄心,洗尽向来儿女颜……”^{[2]369}东渡学习革命经验,在高旭看来是救国的方略。

其实,这种把日本作为楷模的观念,与维新派的日本观在本质上是非常一致的,也就是说,正像维新派把日本作为其提倡改良变法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一样,革命派也把日本作为其倡导革命的有力证据。这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在救亡图存的路线上虽然已经出现了“革命”与“改良”的分歧,但革命派中的大多数,在对日本的认识上还是深受改良派影响的,高旭也是如此。康有为在第四次上奏书中说:“日本蕞尔三岛,土地人民不能当中国之十一,近者其皇睦仁与其相三条实美改纪其政,国日富强,乃能灭我琉球,割我辽台。以土之大,不更化则削弱如此;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5]高旭的涉日诗歌所表现的日本观就是以康有为这种日本观为原型的,可以说他的诗歌正好为康有为的日本“国日富强”说作了具体的说明。

正是由于身为外国人,不了解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社会政治斗争的复杂,不清楚其社会的每一点进步都是经过艰难斗争得来的,不知道一般老百姓为之所付出的代价,因而,高旭诗中的日本,就具有了“桃花源”的特性。而这个从日本现实中反射到他脑中的日本,就成了一面又圆又大又亮的镜子、一把衡量国家强弱标准的尺子,他用它来比照中国的社会现实。所以我们看到高旭的涉日诗歌中,有许多诗都是双声部变调曲:开始以明朗、赞赏的笔调描写日本见闻,写着写着,诗人笔锋突然一转,跳到中国,诗风也一下子转为苍凉、沉郁,甚至悲愤,与前面截然不同。但因为诗人完全出自真情,忧国心切,笔锋尽管变得突兀,却无不妥,读来仍是那样自然,毫无不适。这几乎成为他涉日诗歌的统一风格。

《登浅草凌云阁》中,前四句写日本都会“繁华”,炊烟“欢虞”的升平景象,后四句笔锋一转,“西风瑟瑟水迢迢,苦忆花开故国遥。独依危栏人不识,百端哀感集今朝”。《上野公园看樱花》也是,前半部分是“衣香人影”、“名花美人”,如在画中,怡然自得,但一想到祖国,立刻就是悲愁满怀:“沉沉怀古国,风光正凄切。愁思忽中来,泪迸流泉咽。浩荡怨灵修,谁使金瓯缺。岂无美妙花,惜供他人折。东风恣狂荡,啼洒杜鹃血。日暮登高邱,怅望无言说。”

《登富士山放歌》更是以汪洋恣肆的诗句,对富士山的壮丽景色纵情高歌:“火云烧天天色变为赤,朱霞片片飞散光熊熊。六鳌扬鬣怒触霹雳斧,血花万缕喷吐五色虹……”但当人到山顶,诗到高潮时,突然变调:“披襟直上最高顶,消除块垒长啸剑之锋。男儿到此差快意,从今洗尽芥蒂平生胸。狂来更倾斗酒依绝壁,下览赤县盲云充塞鼾睡浓。警叫一声中华大帝国,天声隆隆震动轩辕宫。无奈偌大睡狮

沉醉颓卧终不醒,垂头丧气爪牙脱落双耳聋。”^{[2]53}这些对满清统治下的中华帝国的绝妙画像的诗句,真是让人又悲又急,禁不住会热血沸腾。

《徂东二月,闻国中大狱又起。酒酣耳热,引吭为歌,亦变征之声也》和《至川越参观少年监狱》也是同样的手法。

回首神州叹陆沉,拔剑斫地空悲愤。梦魂飞上富士山,天风吹我襟怀开。乾坤到此何空阔,海波浩浩去不还。拟挟乡间诸年少,把臂横来渡此间。令他一一发雄心,洗尽向来儿女颜。……民族颠危花眼露,志士弃藏秋后扇。盗憎主人比蛇蝎,千刀万刃恣割宰。刚界强权复侵入,操刀群争比鱼烂。波兰印度奴隶苦,前车之覆剧凄惨。中原供作游牧场,汉家王气果安在?延颈劳劳向西望,龙旗暗淡无光彩。咄尔睡狮及今醒,起看辽东大激战。(《徂东二月,闻国中大狱又起》^{[2]369})

反观病夫国,惨淡无日光。不教而杀戮,政治真荒唐!酿成血世界,人命贱犬羊。哀哉蚩蚩氓,犹说天降殃。静言以思之。泪落难斗量。(《至川越参观少年监狱》^{[2]5859})

诗人身在异域,通过异域这面镜子反观自己的国家,镜像中的中华老帝国身上的弊病就像在显微镜下看标本一样,一清二楚。这种反观貌似悲观,其实是充满希望与企盼的。在诗人内心深处,中国衰败的现实是日本曾经的未来,日本“崛起”的现实就是变革后的中国的未来。从这个角度看,诗人美化日本并予以之对照中国的颓败,实际上都是企盼中国变革并通过变革走向富强。我们看到,高旭诗中的日本形象与苏曼殊诗歌中的日本形象一样,虽然都存在着“乌托邦”化的倾向,但苏曼殊是为了回避中日关系的现实,高旭却是为了促进中国尽快改变现状,诗歌充满了现实关怀,表现出“诗界革命”时代的改良特征,但其中透露出的却是传统的“士”的忧国情怀。高旭美化日本但并没有忘记也并不回避中日关系的现实。他在诗歌里常常提起甲午的惨败、马关的耻辱和辽东(日俄战争)的难堪。

马关订约当年事,客子行经心暗伤。国耻即今犹未雪,游人争说李鸿章。(《过马关》^{[2]47})

庄严乐土妙相逢,花草秾华映眼中。恨杀东皇无意思,先教海国占春风。(《东京元旦》^{[2]377})

囊中宝剑不平鸣,踏破三山梦魂惊。东国即今刚战胜,唤人痴睡鼓鼙声。破碎山河撼朔风,群生弹指化沙虫。陶尧铸舜伊谁责,独立苍茫怀福翁(福泽谕吉)。(《送热忱子归国》^{[2]378})

俄警英狮日蟒蛇,一齐攫啖到中华。思量此际无言说,满目凄凉恨岂赊。(《游东三省动物园》^{[2]133})

西方白狄骄无比,东海黄龙荡不收。他日归来君莫问,好挥铁血洗神州。(《力山东渡话别海上》^{[2]67})

南下长蛇逞剪屠,泰山危卵要人扶。伤心辽海风云黑,奈何东方一病夫。俯仰随人不自由,国权让去再还否?两雄胜负且休问,兵费烦君赶速筹。鹰思飞跃鹞高翔,解决平和顿绝望。搁起满韩交换论,药烟硝雨郁苍苍。甘心为马复为牛,祸促瓜分民族羞。中立岂输独立好,汉儿依旧拜天囚。(《感日俄

战争而作》^{[2]352)}

诗人马关的耻辱而伤心,因为“海国”日本已占先机,中国却仍“痴睡”不醒而焦虑。日俄战争的炮火,对诗人来说犹如声声鼙鼓,他已感到祖国被瓜分的威胁越来越近,不仅“西方白狄骄无比”,东海的日本也羽翼丰满,中国面对的是“俄鸷英狮日蟒蛇”,是东西方帝国主义侵吞的血盆大口。高旭的诗表现出他已经充分意识到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与威胁,他把日本与西方列强相提并论,称之为“东海黄龙”。面对日俄“两雄”在中国领土上争胜负,中国政府却只能“中立”,而且还得负责筹集“兵费”的尴尬局面,高旭感到羞耻,并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担忧:中国人难道真能“甘心为马复为牛”,做“俯仰随人不自由”的囚奴吗?面对如此危机,谁来担当唤起国人自强不息的启蒙者,怎样才能使懵懵懂懂的“群生”成为“尧舜”呢?虽然为了救国到日本学习,但诗人明白救国只能靠自己,“信美非吾土,依人觉汝羞”,因此他和友人共勉“不甘偕木石,拼欲作牺牲”(送叔子归国)。要以生命来捍卫自己的国家。1905年9月,高旭在东京创办的《醒狮》杂志,以“输入文明学说,提倡国民尚武精神”为宗旨,实际上也是他谋求救国的一种努力。这一年,他还步岳飞的满江红韵写下了《满江红·东京寓楼偶读岳武穆作,感步原韵》^{[2]273}表达自己救国的决心。

板荡中原,三百载,文明消歇。最痛心,岳爷死后,无人争烈。精卫恨填东海石,胡兵醉踏中华月。笛声来,一曲念家山,思归切!

孤臣操,冰与雪;沧桑感,谁能灭?忆当年愤把唾壶敲缺。炸弹轰残豺虎窟,河山染遍鲸鲵血。庆重生再见汉衣冠,唐宫阙!

可是,要使积弱已久的中国强盛,的确是异常艰难的。腐朽的封建王朝还在作威作福,革命党、改良派意见不一,千万民众尚未启蒙……要做的事太多却又无头绪。面对这样的现实,诗人禁不住吟叹:“移山思猛士,卫石感精禽。种种罗蒲发,劳老屈宋心。可怜当世事,相视恐难任。(送叔子归国)”“看着眼前已然被“米锦欧花”“点缀”得非常近代化的日本,回望自己满目疮痍的祖国,诗人常常既悲又痛:“海天寥阔刷愁绝,万里回头恨国门。(赠髯侠,即步其韵)”“中原文物似前不?浮云遮日使人愁。(《浣溪沙·思祖国》)”甚至连给爱人的诗中,都常常吟哦这种内心的痛苦。

为哭苍生泪眼揩,中原浩劫痛无涯。(《东京寄亚希女士》^{[2]368})

白骨中原乱似麻,风凄雨泣茁龙蛇。只今八万三千日,上帝无言空落花。(《海外杂咏·只今》^{[2]60})

挑灯谁与语?时复读《离骚》。此日沉湘水,它日溢洞箫。绿蕉愁里听,红豆酒来浇。国破山河在,西风骨已销……故国怀芳草,天涯听杜鹃。(《东京寄亚希》^{[2]56})

从前揭诗中可以看出,高旭对日俄战争有着清醒的认识,同样的观点也表现在他主办的《觉民》所

刊文章中。一篇署名自新,题为《日俄战事之结局即中国灭亡之末途》的文章和高旭的《感日俄战争而作》,皆对这场战争有极为透彻的分析。

使言乎日胜俄,则中国遂可免乎?夫日本自明治政变以来,以区区三岛,一跃而为一等强国。及甲午之役,战胜中国。于是益骛骛乎有王长黄人,冠冕东亚之概。洎乎西人瓜分之说盛行,日人以车辅之故,不能不有概于其心。于是作为仁义,建东亚同盟之会,持保持东势之说。凡此作为,岂日人诚有爱乎中国哉!以唇齿之害相及,与强俄之迫处其侧也。数年之间养精蓄锐,今则其机已熟,其势已成。值满州事起,遂假俄人而一逞其锋。乃一举而毁其坚艇,再举而陷其要口,三举而裂其巡舰,弊其总督。使循此以往,擢强俄而北之,收满州,缮兵备。当此之时,势力充饱,已足与欧美列强抗衡并驱。既据优胜之地,又无北顾之忧。夫得陇望蜀者,振古之恒情,乘胜而进者,扩国之要点,势必倒戈南向,窥伺中原。而列强眈眈,岂甘日人独步。不实行瓜分政策,乌能使势敌力均乎?信如斯也^{②88}。

该刊九、十期合本上另有一篇题为《日俄胜负后之影响》的文章,也尖锐地指出:

日本大胜俄,俄势稍杀。而中国人欣欣然有得色。呜呼!日胜俄,中国果足恃乎?夫俄胜之非中国福,三尺童子知之矣。抑知日胜果何如?自记者之眼光观察制,则以为无论日与俄之孰胜孰负,均非中国之利也。使俄胜日,中国立至瓜分,使日胜俄,中国亦必失去主权之一部^{②13}。

文章虽不一定出自高旭之手,但主编刊物的高旭选中这些文章刊出,本身也足以说明他的观点。尽管高旭在日留学时的诗歌创作对日本多有赞美之词和乌托邦想象,但早在留学前的1904年,他就已经对日本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了。可以看出,高旭对黄遵宪一代的日本观是有所超越的,他赞成积极地学习日本社会改革的成功经验,并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对“同文同种”的日本也确实怀有亲近感,但对于日本本质和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他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和估计,比同时代的许多人要看得深远。如果我们不为尊者讳、贤者讳的话,可以看看同时代的秋瑾写的关于日俄战争的诗。

狡俄阴鸷大无信,盟约未函莽寻鬻。全球公理置不珍,夺我陪都恣蹂躏。

当时警语至外交,十年不觉祸以包。经营未半机谋露,转瞬松花起怒涛。

喋血瞋人侈虎视,蚕食东方势未止。明治天皇雄武姿,独立精神寒鉴齿。

奋发神威不可当,投袂扫穴殴贪狼。将军爱国皆擐甲,侠士闻风尽裹粮。

貔貅海上军容壮,冒雪凌霜如挟纩。一炬横飞敌舰摧,精魂都向波中丧。

何物么么不自思,怒车螳臂敢相持?一歼再歼慑其魄,无日堂堂三报捷。

捷报飞来大地欢,从今世界庆安澜。草木山河皆变色,未许潜蛟侧目看。

②见《《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

仁乎壮哉赤十字,女子从军卫战士。吁嗟一线义勇队,唤起国魂强宗类。

掀天揭地气不磨,吮血吞冰勿蹉跎。几欲起舞乘风去,拍手樽前唱凯歌。

(《日本服部夫人属作日本海军凯歌》^[6])

秋瑾的这首诗写于日俄战争爆发(1904年1月)后不久,与高旭的《感日俄战争而作》、自新的《日俄战事之结局即中国灭亡之末途》差不多同时(该期《觉民》月刊发行于1904年3月),但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和中国未来命运的认识却大不相同。与秋瑾的站在日本一方谴责帝俄,天真、单纯的为日本的胜利“拍手”、“唱凯歌”、“几欲起舞”相比,高旭则认识到“两雄”之争,都是为其在华利益的最大实现而争,无论谁胜谁败,中华民族都面临着危机,他的痛感“俯仰随人不自由”,担心“国权”丧失、民族失去“独立”和对日本觊觎中国野心的忧虑,显然要深刻得多,而且后来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他的担心并非多余。当然,由于甲午之后的1896年签署的《中俄密约》使清政府上当受骗,受制于沙俄,许多中国人对帝俄扩张有所警惕,但对日本野心估计不足。如1898年11月梁启超致大阪日清协会山本梅崖书中就说:“仆以为露(俄)之为东方患,虽五尺童子皆知之矣。然我东方欲自保立,必及露人羽翼未成,庶几尚可以止之^[7]。”由于“中国久受俄人凌虐,故当日俄战争期中,一般皆怀兄弟急难之义,虽云中立,在精神上及物质上均为日本之助”^[8]^[216]。当时改良派的“郑观应等在广州等地捐款组织赤十字社,准备治疗日本伤兵;革命派中也有人倡议‘编成义兵’,附入日军,去打头阵”^[9]。可见秋瑾的态度也属正常,这恐怕也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态度。因为连朝廷都是在战事结束才明白过来日本是要取俄国而代之的。“待战局既定,和议已开,清廷始知日本志不在小,将有以暴易暴之惧”^[8]^[216]。惟其如此,高旭他们的看法就更为可贵。需要注意的是,像当年许多曾留学日本的人一样,高旭对日本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既警惕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对之怀有戒心,又对比中国先走向强国之路自己曾学习生活过的那个岛国有一种难以表述的情感,这在他1910年作的一首诗及该诗的小序中都有所流露。

乙巳登富士山,拾石一拳,纳诸行篋。今适启

视,俨然犹在。诗以咏之。

黄流日夜涛声哀,一舟横渡胸开怀。袖中藏得富士山,掉头不顾归去来。(《高旭集》^[2]^[130])

通过分析高旭的“涉日”诗歌,我们可以看到,由黄遵宪开启的自甲午战争后普遍被中国人接受的日本认识——日本是我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老师,正在发生着变化。当然,中国人日本观的变化,主要是由日本自身的所作所为所决定的,正是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使中国对这个曾是自己学生又是自己老师的东邻产生了戒备与敌对心理,试想,连日俄战争结束后代表俄国与日本谈判的威特伯爵都说:“日人欺凌其同种同文同宗教的中国,静言思之,毋乃不智乎?”^[8]^[203]中国人对此怎会无动于衷?高旭的诗正是记录了中国人在这样的历史中的真实感情,他表现出了甲午后形成的中国人日本观的微妙变化,这也是在以后的中日关系中,中国人日本观变化的开端。

参考文献:

- [1] 王晓秋. 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M]. 北京:中华书局, 2000:347.
- [2] 郭长海,金菊贞. 高旭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3] 王向远. 比较文学学科新论[M]. 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 [4] 黄遵宪. 日本杂事诗广注[M]. 钟叔河,辑注点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63.
- [5] 依田熹家. 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6] 刘玉来. 秋瑾诗词注释[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146.
- [7] 汤志均. 乘槎新获——从戊戌到辛亥[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 [8] 王芸生.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M]. 北京:三联书店,2005.
- [9] 杨天石. 从帝制走向共和[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07.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Outlook on Japa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om Gao Xu's Poetries Related to Japan

CHEN Chun-x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Gao Xu, a poet of Nanshe, once went east in the big trend of studying in Japan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during which he composed lots of poetries related to Japan. By the poetries, not only had he narrated his experience of living abroad and showed his reflections on the reality of China, but also revealed the Chinese outlook on Japan of his, which was a representative view among Chinese cleric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Gao Xu; poetries related to Japa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inese outlook on Japan

(责任编辑 胡志平)